

民国高级将领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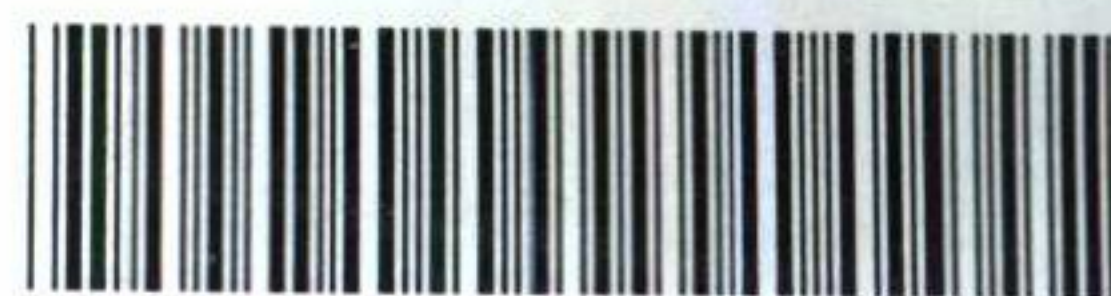
MIN GUO GAO JI JIANG LING LIE ZHUAN

列传



解

军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5 8869 1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2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2)/王成斌等主编. —2 版,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ISBN 7-5065-0682-3

I. 民…

II. 王…

III. 军事人物…列传…中国…民国

IV. K825.2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解放军运输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9 年 1 月第 2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875

字数 46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共七集)

0735/19

出版说明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适应这一形势，我社与南昌陆军学院商定，于1985年7月开始编撰《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所介绍的对象，主要是1925年至1949年期间的上将，以及一些职衔不高但与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社会影响较大的将领。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者未列入编撰范围。重点是记述他们从军、从政及其他方面的重大活动，力图比较系统地再现纷纭复杂的民国历史、军史。希冀深刻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谛；希冀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翔实而鲜为人知的史料介绍，有利于中国革命史的教学和研究，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从一个侧面增长历史知识，更好地了解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深刻地理解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对于振兴中华，使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意义。

这部书，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把政治性、军事性、史学性和文学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特别注意坚持三个为主：首先是以尊重客观史实为主。对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功过是非，均以事实说话，尽量少作评论。其次是以写重大历史事件为主。注重反映人物的主流，对生活方面的问题，不铺陈、不渲染，点到为止。再次是以军事活动为主线体现人物的社会角色作用，力求简化作战过程，着重描述人物在重大战役战斗中的战略战术思想与指挥艺术，主政或参政活动突出独特作为，以体现高级将领的特点。

编撰此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广泛，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但其主要来源是：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全国各级政协、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历年搜集的文史资料；全国各出版单位出版的回忆录、名人传等；以及作者走访撰写对象的亲朋好友所获的一些原始资料和口述材料。选择资料时，注意多方面地进行比较、鉴别和考证。对那些众说纷纭的资料，一般的处理原则是：原始记载的与回忆的，以原始记载为准；第一手的与经过加工的，以第一手的为准；当事者提供的与间接者提供的，以当事者的为准；多数人的说法与少数人的说法，以多数人的说法为准；正式出版物与民间流传的，以正式出版物为准。不少稿件还经过有关部门的领导、专门研究人员，及撰写对象的家属、同事的审核，有的还与本人见过面，力求使撰文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

这部书将分册陆续出版。分册原则按作者成稿的先后顺序。各册人物编排的次序，均按姓氏笔画排列。

这部书的编撰工作得到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政协、统战、联络、历史研究等部门的鼓励和支持。有的单位为此专门拨给经费。作者遍布于全国的许多文史研究室、社会科学院、地方与军队的高等院校、报刊杂志社等单位。他们当中，有长期从事民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教授、讲师、记者、编辑，还有一些知名人士、业务领导。年龄最大的八十多岁，最小的只有二十来岁，绝大部分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积极、热忱、严肃、认真，有的为了保证稿件质量，不厌其烦，一改再改，反复斟酌；有的为搜集和核实资料，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多次到撰写对象老家走访。在此书问世的时候，谨向热心此书编撰的领导、作者，以及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系统地编撰《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在全国还是第一次，难度较大，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补充修订。

目 录

方鼎英	(1)
石友三	(17)
冯钦哉	(33)
刘 峙	(47)
刘汝明	(62)
刘镇华	(73)
孙立人	(84)
孙殿英	(99)
杨 杰	(116)
张治中	(142)
张岚峰	(182)
何成浚	(195)
宋希濂	(208)
严立三	(226)
吴奇伟	(239)
杜聿明	(251)
苏炳文	(280)
李济深	(292)
李品仙	(315)
李家钰	(334)
罗广文	(345)
佟麟阁	(355)
胡 璉	(370)

胡宗南 (381)

赵登禹 (409)

商 震 (419)

盛世才 (445)

鹿钟麟 (468)

曹浩森 (491)

傅作义 (501)

程 潜 (538)

方 鼎 英

(1888—1976)

方鼎英，号伯雄，又名同春。陆军中将。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代理校长、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抗战后期，闲居湖南新化老家。从1948年秋开始，在家乡组织“迎解军”，并与唐生智合作，发动和平自救运动，开展迎接湖南解放的工作，支持程潜、陈明仁等将领率部起义。在这期间曾秘密托人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缨，后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被委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军事顾问。

一

方鼎英，1888年4月7日生于湖南新化县圳上方家湾。父亲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穷秀才，在方鼎英四岁那年去世。其母龚夫人勤俭抚孤，鼓励幼子成才。他五岁入家塾读书，深感“家道艰难，益自立志，奋发图强，不敢萌懈怠”，学业成绩优异。十岁时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进入新化县白溪市大成书院，除学习《策论》外，还接受历史、地理等新科学知识的教育，曾上县城参加过幼童考试。后由内表兄张斗枢（留日学生）介绍，到省城长沙明德学堂乙班学习现代基础科学知识。在这期间，他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等小册子，产生了学军事的意念。1903年初，他

步行两天两夜，赶赴湖北武备学堂的招生考试。因虚报了五岁，“身長不够一根枪杆长”，被主考官刷了下来。3月，考入省实业学堂（即后来的高等工业学堂）学习。

1904年春，湖南巡抚赵尔巽选派五十名学生去日本留学。方鼎英由实业学堂推荐，经过考试被录取。先入巢鸣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兼补习普通科学知识。他与留日学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陈天华一起住在同乡会事务所。不久，由陈介绍加入了革命团体，后随团体转入同盟会。在这里，他认识了孙中山，结识了许多革命人士。次年，考入振武学校。当时，他系一文弱书生，操练颇感吃力，便每天坚持早起晚睡，躲到学校的树林里，操练铁哑铃，做柔软体操，洗冷水澡。不到半年，体质明显增强。三年学成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09年，参加同盟会的“求知社”，与蔡锷、唐式遵、宋教仁等同是一个小组的成员。他主张回国后，发动兵变，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方鼎英从日本回国，被分配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入伍生总队，任炮兵教官。这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他约同当年士官学校的同学三十余人，南下武汉，投入起义军炮兵司令部工作，参加了攻取汉阳的战斗。随后，到湖南岳阳镇守使府曾继梧的司令部，任参谋处长兼教练科长。后来，镇守岳阳的部队发生内讧，他代表曾继梧前往长沙，向省军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因无结果，遂愤而辞职。1914年，到北京政府陆军部任中校一等科员，负责编纂陆军炮兵操典及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等书，用部令颁行全国。蔡锷在北京密谋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时，派石陶钧赴美国联络黄兴，其所有往来信件，都由方鼎英秘密转送。

1917年，方鼎英受北京政府派遣，携带眷属东渡，留学日本。在东京陆军炮工学校普通科、高等科及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毕业后，又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一年。先后共达四年之久。

二

1921年，方鼎英应湖南都督赵恒惕等“求知社”同志的电邀，从日本回国，任湖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7月，湖北发生“宜武兵变”。他任援鄂军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援鄂兵败，赵恒惕向吴佩孚投降。他再三劝赵：“表面上可以向吴佩孚虚与委蛇，骨子里还应站在革命立场，向广东看齐。”但赵口诺心违。1922年，他便借北京黎元洪政府组织军官赴日本观看秋操的机会，出走日本。不久，回国路过上海，专门拜访了原湖南都督谭延闿，说：“赵恒惕已死心降吴佩孚，不可药救，非由广东来个根本解决不可。”并劝谭跟随孙中山革命，在湖南发动倒赵运动。

1923年，孙中山委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令其入湘讨伐赵恒惕。8月7日，谭赵战争爆发。当时，原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第二师师长鲁涤平，虽然被谭分别委任为讨贼军第一、二军军长，但其部下的旅、团长大部分通款于赵，故持“中立”态度。时任宋鹤庚部参谋长的方鼎英认为，宋、鲁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占有优势。他向宋提出了“拥赵？拥谭？自干？滚蛋？”四个方案，派军法官送去，并捎话给宋：你如不表态，“吾将先行（率部队投谭延闿），恕不等待也。”在这种情况下，宋鹤庚才对方说：“我已决心滚蛋，赴沪休养。”遂以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的委任状及印绶，交给方鼎英代行。因宋师的第一旅旅长贺耀祖，第二旅旅长唐生智皆系拥赵的骨干分子，是部队中的实力派，方只带走了少数部队，赴衡阳与谭延闿会面。

这时，谭赵双方正在湘潭、株洲一带胶着。方鼎英见长沙空虚，便通过湘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辉瓒策动湘军第一混成旅的朱耀华团长（赵恒惕的叶开鑫部下）率部反赵。8月31日，在朱耀华团的配合下，他率部突然袭击长沙，赵恒惕仓皇逃往醴陵。9月1日，方鼎英与张辉瓒的部队占领长沙后，赵恒惕在吴佩孚部的增

援下，调集所部反攻。他指挥部队撤至湘江西岸，经株洲、三门、昭陵、淦田、朱亭溯流而上，退往衡阳，与谭延闿部靠拢。10月中旬，北军马济、谭道南、葛应龙等部向粤汉、萍株铁路节节进逼，并进驻常德、长沙等地。赵恒惕准备向谭军大举反攻。就在这时，陈炯明叛军又进攻广州，孙中山急电谭延闿回师救粤。方鼎英也随谭到了广东。

当谭军驰援孙中山时，与陈炯明呼应的江西督军方本仁率部进攻广东北江，前锋已过南雄，到达周田，韶关危急。谭延闿所率湘军第二、三、四军沿始南大道堵击。方鼎英奉命带领第一军，由始南大道右侧，翻山越岭，向始兴河中游地段急进，威胁赣军的左翼。这时，方部已精疲力竭，粮饷、械弹、衣服、费用都缺。他身先士卒，每日吃红薯度日，鼓舞官兵士气，坚持苦战到第十一天的拂晓。随后，他派出一部突击始兴城的东侧高地，俯射始兴城之敌，威胁其退路。赣军溃败后，他率部朝始南大道跟踪追击，其右翼在始兴城外遭到赣军伏击。在紧急关头，他冷静地命其一部掩护主力抢占有利地形，顺利地脱离了险境，继续向南雄追击，直到赣军全部退出广东。在这次战役中，他收编了赣军主力之一的第九旅旅长高凤桂部。战后，得到了孙中山的特殊嘉奖，获赠八挺手提机关枪。

1924年秋，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率领湘、滇、粤、陕、闽、豫各军，取道江西北进。当时，方鼎英留在广州养病，其部由湘军前敌副总指挥宋鹤庚兼领。不料部队到达吉安时，为江西军阀方本仁“诱敌深入”之计所败。谭延闿叹道：“伯雄在此，决不致是。”方鼎英闻讯后即抱病北上，赶到赣南南康。谭一见他便说：“如何是好，有何面目见人，这样垮下去，所剩残兵败将，何词再向广东要钱呢？”方鼎英建议，“所有官兵，到南雄集中待命，实行整编”。并受任整理副监，协助总监谭延闿把湘军残败的五个军整编为七个团和一个讲武堂。他被谭委任为讲武堂教育长，将编余军官集中训练。

这年冬天，宋鹤庚率领第一军进驻湖南汝城，受到滇军和赵恒惕部的夹击，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方鼎英为了带回这个部队，向广州革命政府大本营的参谋长方声涛建议：“以大本营的名义，和赵恒惕密约，请允许方鼎英部从湘西借道，会同盘踞在湘西的蔡巨猷（湘西镇守使，谭封的湘军第六军军长）部、川军熊克武部（号称五万人）组成北伐先遣军，东下湖北，与岳维峻会师武汉。保证不过三个月，将湘西数十县的地盘交还给湖南，我相信赵恒惕是乐意这样做的。”方声涛同意此计划，以大本营的名义，任方鼎英为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他接令后，率领自己的卫队营，驰赴汝城，向宋鹤庚的部队宣布了大本营的命令。但赵恒惕给他的电报只说“欢迎晋省叙欢”，只字不提借道一事。他知道情况有变，乃命部队按战斗序列前进，经宜章、临武、蓝山、宁远、东安、新宁、洞口、安江、辰溪，到达沅陵的九峰山。这时，赵恒惕命令唐生智的第四师第一旅旅长何键率部堵击，滇军朱培德部的王均师又将其后路切断。他只好赴唐生智司令部会谈，把部队交给唐收编。赵恒惕知道后，电令唐生智将其枪毙。唐却以礼相待，赠给款项，并派轮船将他送往长沙。方鼎英到长沙后，只身闯入省府，痛斥赵恒惕口是心非。后在老友、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将领曾继梧的保护下，安全离开长沙，暂回汉口家中养病。

三

1925年8月，方鼎英应谭延闿的电约回到广东。11月，经谭推荐，被蒋介石聘为黄埔军校入伍生部中将部长。他将办事机构设为秘书、总务、军事、政治、外语诸科。根据学生文化程度不齐的特点，特设置普通科学课程，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还翻译审定了军校的四大教程。他每天早晨提前起床，到操场检查学生操练，晚上迟睡觉，查看学生寝室。经常给学生讲话，提倡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精神，鼓励学生自觉自愿地锻炼身心。

次年4月，方鼎英被蒋介石委任为黄埔军校代理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部长。他见学校的职员从保定军官学校及云南讲武堂出来的居多，校长蒋介石又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故课程设置及规章、条例等都是仿照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旧框框，与现代军事不相适应。于是向蒋介石建议：“要想教好学生，必须先要好的先生，这就得广揽人才”，“望今后用人尺度放宽些，即给予进黄埔的军事人才较高的待遇”。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使学校的人才不断增加，规模逐步扩大。当时，原教育长何应钦，对校方接收一些来自军阀部队的军事专业人才不满，说让那些人钻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们只好卷着被包走好了”。方鼎英责何说：“你何必小观人家呢？难道就不允许人家革命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方鼎英请求辞去校职，回谭延闿的第二军参加北伐。蒋介石坚留不许，说：“黄埔军校乃本党之命脉所在，今大军北伐，学校的一切，完全交由你主持，也就是将本党命脉交给你了，责任何等重大，何遽言辞呢？只要你带好学生，将来还怕没有兵带仗打吗？”并加委方鼎英为代校长兼黄埔要塞司令、军校兵器研究处处长。临行前，蒋介石还召集全校学生及教职员于大操场上，一再交代说：“我北去之后，大家要跟我在校时一样，遵守校训，‘亲爱精诚’，好好服从方教育长的领导”；“方教育长对我校长来说是前辈（蒋为留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方为八期），我校长都把他作为先生一样看待，方教育长不独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校长的老师。”

方鼎英在黄埔期间经历了两次重大政治事件。一是“中山舰事件”。在这之后，他听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黄埔军校党代表的汪精卫，要发动第二、三、四、五军打倒蒋介石，便力劝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放弃这个行动，说：“今天广东的一、二、三、四、五军，犹之一家五个兄弟一样。今兄弟之间，既有一个发疯（指蒋介石），那么其余兄弟，只能想方设法，为之治疗，使这个疯病者快些好，才是兄弟应尽之道”；“动武的话，其结果只有两个：一

个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一个是相持不下的自行僵化，都是敌人所欢迎的”。他认为谭延闿是五个军长中“年龄最长、资格最老，而且是唯一能够说话的人”，要谭出面“调停”，使“兄弟相互启发与帮助，而能够和好如初”。

二是“四·一二政变”后，黄埔军校进行“清党”。方鼎英对时任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国民党中央党部后方留守负责人朱家骅，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等人说：“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去年决定北伐时，鉴于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同时，对学校的“清党”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属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请给我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川资。他还说：“至于熊雄主任（校政治部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不得而知，但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他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另请高明。”这些意见得到了李济深的默许。4月14日深夜，他送给熊雄两千五百元港币，并用蒋介石乘座的小汽艇送其离开黄埔。但是，熊雄还是在广州被捕杀害。

方鼎英这些措施，被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熊雄去后接任的），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学校“清党”委员会执行委员陈超、乔家才等人，作为破坏“清党”的“证据”，向蒋介石告“御状”。他面对胡靖安一伙借“清党”为名，把黄埔军校搞得乌烟瘴气的情况，也把蒋介石所说的“学校任何问题，可以照章处理”的“尚方宝剑”搬出来，宣布给胡靖安以纪律制裁，使

胡“敛迹潜逃，歪风邪气，立即停止”。

方鼎英在任教育长期间，根据各种部队的需要，增设了特种兵班，改变了单一培养步兵初级军官的格局。在黄埔军校三周年的庆典上，他欣喜地宣布：“三年来军校从步兵一种到骑兵、炮、工、辎及军工专科无不设立，从五百学生到二万学生，经费由三万元到五十多万元，增加十多倍，人增加四十多倍。”当年的学生说他是“一位和气慈祥的忠厚长者”、“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廖仲恺说，方计划作战跟蒋介石的作风完全两样。“介石遇有重大决策之前，必关起门来，独运神思，考虑三天始成熟”；而方“则对敌我友情，集思广益地尽情讨论，一经决定，便对照地图执笔疾书，倚马可待。可谓运用之妙各有千秋矣”。

四

1927年秋，方鼎英离开黄埔军校，担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在李宗仁、白崇禧西征讨伐唐生智时，他率领十三军和粤军李福林、桂军黄绍竑部的各一部，及滇军范石生部为中路军，由湖南郴州向长沙北进，计划与第六、七两军会师武汉，夹击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可是，当他的部队在年底到达莱阳时，唐部已被李、白改编。这时，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往南京复职，打电报给方鼎英征询意见。他当即回电说：“如要复职，惟继续北伐，才有政治生命，吾当率部追随。”蒋介石复电说：“一到南京，即行宣布北伐。”他接电后即率部绕返韶关，转道赣浙，前往南京，准备参加北伐。

方鼎英的先头部队将到达韶关时，正值滇军范石生部朱德团（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将余部暂编入了范军，以解决粮饷之需）经帽子峰向江西井冈山进军。他即命令部队戒备前进，与走在前头的朱德团总是相隔一日路程。抵达韶关时，李济深电请方鼎英把部队开往广州，说已派参谋长张文携款二十五万元来慰劳。他

知道当时蒋介石与李济深的矛盾已经尖锐化，没有答应李的要求，命令部队继续向南雄进发。这时，朱德团仍然在方部前头北进。到达赣州后，朱德团已向湘赣边界转进。方部即经于都、宁都、南丰、金溪、上饶，进入浙江。1928年春，到达南京，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他任军长。

这年5月，“二次北伐”开始。方鼎英兼任津浦路运输总指挥。正当他准备组织指挥部时，“济南惨案”发生。留守在南京的谭延闿，接到蒋介石关于如何解决此案的电文后，感到束手无策，问计于刚回南京的方鼎英。方认为：“济南惨案”是“日寇欲灭亡中国，已准备差不多了”的标志，“中国除了准备同它拼斗以外，是别无其他办法的”。他对谭延闿说：“我们新化有句俗话，‘双手难摸两条鱼’，现在我们用全部精力捉军阀这条鱼，尚未捉到，……从东海又来了鬼子这条大鱼，更非双手能轻易捉到的。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济南惨案’应暂由外交途径去对付。待北伐成功后，再用新的办法去解决。”谭延闿接受了这个意见，要他转告给蒋介石，由国民政府派外交部大员王正廷再一次与日本谈判。

“济南惨案”的善后工作就绪后，方鼎英受蒋介石之命，任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领贺耀祖的第四十军（贺此时已卸所兼军长任）、夏斗寅的第二十七军、张克瑶的第三十三军，配合孙良诚、方振武两个军团，沿津浦路向北追击溃退的孙传芳、张宗昌部。至沧州以南的南皮、孟村、冯家口一线时，忽然风沙弥漫，自北而南飞扬，举目不见咫尺。他觉察到这是“我军北进最难，而为敌人向我袭击的绝好机会”。为扭转这种危险局面，便出敌不意，指挥部队向孙传芳部发起突袭。孙鉴于新败，将士心有余悸，北窜天津附近，接着带着少数亲信逃出山海关，其残部为蒋介石的部队改编。

“二次北伐”刚一完成，方鼎英特地赶到北京，向在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守陵的蒋介石进言：“总理遗嘱，要我们打倒军阀，完成北伐。这次战役是告一段落了，可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矣。其

次，我们所应做的，便是打倒帝国主义者，取消不平等条约了。”他说：“帝国主义很多，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诸帝国主义者中，对我们最凶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应作为我们的首要之敌。”“盖‘济南惨案’已是口欲之我，而砍了我们头上的第一刀，如再不准备对付，则它的第二刀、第三刀，随时会砍来。建议采取‘攘外以安内’之策，对日本‘定一预备十年的军事计划’。认为‘只要能以党政对内，绝对避免军事行动，有了十年的军事准备，日帝虽强，我敢包打’。对据关顽抗的奉军，他已事先三次派人与张作霖父子最相信的总参谋长杨宇霆取得了联系。这次，他向蒋介石请求说：“你写一亲笔信，交我赴山海关，把杨宇霆喊来见你，一切由你当面交代，这样奉军亦就可以不战而归矣。”蒋介石听到这里，以拳击掌说：“好啊，当然我们应该这样做。”方见蒋介石答应如此爽利，心里非常高兴。

事隔几天，蒋介石任命方鼎英为胶东总指挥，说：“山东胶济路上，有一股匪徒，匪首名叫刘黑七，拥众数万，已有前来投诚之意。这些关系，在何雪竹（何成浚表字）手里，我要他交给你。你可带第三军团，再加派缪培南第四军归你指挥，开赴该地，把他们收编下来。”他看透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争夺地盘的用心，便说：“现在山东主席孙良诚是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一个总指挥，刘黑七是他防地内的一股匪的首领，孙自己不会收编吗？如果我去帮他的忙的话，孙是否同意哩？如果不同意的话，我这一去，不免有挤孙夺地盘之嫌，将来孙一多心，遇事与我捣乱起来就麻烦了。那时候，莫怪我不会办事呀。”蒋连说：“不会的，不会的。”他只好受命而行，将部队经德州向山东境内开拔。途中又忽然接到蒋介石“中止胶东之行，将部队复员，各返原防”的电报。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后，方鼎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师师长兼步兵第二十八旅旅长。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常委会也通过方为福建省主席的决定，可他坚不就任。